

俗世·男女·梦 ——评小说《青瓷》和《红袖》

刘智跃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中文系, 湖南长沙, 410002)

摘要: 小说《青瓷》《红袖》发表以来, 在社会上激起了较大反响。作为新世纪比较成功的通俗小说, 它们揭密了当代社会某个角落的黑幕, 逼真地再现了经济社会里人们对权钱的强烈渴望, 以及在钱权驱使下的欲望膨胀和人性堕落。浮石的商场小说, 常常选取利益与权力的纠缠和共谋, 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进行叙事。从《青瓷》到《红袖》, 作家的写作姿态和价值观还发生了某种微妙的转移和提升。

关键词: 当代文学; 通俗小说; 浮石; 《青瓷》; 《红袖》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0)06-0147-04

《青瓷》而后, 浮石先生继续着其好“色”之旅, 于2008年又推出了他的另一力作《红袖》。《红袖》而何? 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 拍卖题材再次登场, 其拥有的窥癖效应已经大为缩水。如何再掀读者兴味, 便是作家须着力解决的问题。早在《青瓷》推出的时候, 市场宣传便是围绕其对商战谋略、人际关系等问题的启发, 俨然一副推销成功宝典的姿态。《青瓷》成功的经验, 又被《红袖》重拾。而从小说题材、结构等方面来说, 《红袖》之于《青瓷》并没有延伸出多少新意。当然, 这也许并不为浮石先生注重, 他需要的只是市场的认可。

—

浮石先生不是一个描写、刻画的高手, 但他擅长讲故事。他的小说, 就是以故事为核心组织起来的一个个同心圆, 犹如投入湖面的一块石头激起的一圈圈涟漪。故事核心是一个拍卖标的, 好比那块石头, 它价值连城, 闪烁着耀眼的光。正所谓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在这样一份大蛋糕前, 簇拥着一群竞相逐利之徒。许多人蜂拥在四周, 呈里三层外三层之势, 虎视眈眈, 垂涎三尺。继而, 争夺开始了。

《青瓷》写争夺, 《红袖》仍然写争夺。浮石先生的意图就是写出一场场争夺的过程及其人事关系的真

相。这就是他要讲述的俗世浮生中的现实故事。

范伯群先生认为, 通俗小说虽然被人说成是反映生活的“低层次的真实”, 但是, 相比于那些将一颗幼苗写成“参天的大树”的“高层次的真实”来说, 通俗小说的可贵之处也在这里, 即它的“存真”^[1]。在这方面, 《青瓷》、《红袖》确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当代小说目前还很少触及的社会层面的真世相。

这个俗世图中有两个核心, 一是“钱”, 一是“权”。

小说题材写拍卖行的市场竞争, 但是由于管理体制和文化心态等方面的原因, 竞争却并不局限在同行之间, 而是多方面竞争角力的结果, 是一场不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交易。或许这就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大众心理。于是, 围绕着标的物, 拍卖的被委托方拍卖公司、拍卖的委托方法院、债务人、债权人甚至竞买人之间展开了一场场并不对称的角逐。

对债权人和债务人来说,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但是事情弄到需要法院审理执行, 以拍卖的方式清偿债务的时候, 已经不再是道德意义上的债权债务了, 而是市场经济社会里常见的民事纠纷案件。其争执的焦点, 无非钱财, 利益分配。在《青瓷》中大家瞄准的是胜利大厦和香水河法人股, 在《红袖》中则是流金世界裙楼。这些都是动辄几千万直至几个亿的业务。一场拍卖下来, 按行规百分之十的佣金标准算, 拍卖公司可以坐收几百万到几千万。这么大的金钱数额, 谁不眼红啊!

钱财的欠还过程发展成纠纷, 打起了官司, 其涉

及面就不再局限于当事人双方了。这就是问题的复杂之所在。在多方牵及的情况下,作为拍卖委托管理方的法院,有着很大的决定权,起着关键的作用,但也是最容易发生以权谋私和滋生腐败的地方。

法院地位如此重要,于是成了被委托方拍卖公司全力攻关的对象,这样,原本是被委托方之间的竞争结果就演变成了委托方内部的权力较量和利益再分配,小说准确地把握到了这一点,详细写出了委托方内部的矛盾和复杂性。因此,从情节分配来看,小说重点围绕着法院内部各方的关系来写,基本上不写拍卖公司同行之间的竞争,是有道理的。关于胜利大厦的拍卖委托,张仲平和徐艺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决定于侯昌平与鲁冰之间的角力。由于张仲平已经做好了侯昌平的工作,而徐艺则攻了鲁冰的关。最后张仲平和徐艺只好做了折中处理,联手承办这笔业务。虽然是这样的结果,张仲平还是得跟侯哥表态,他原来以为可以一个人拿下来时跟侯哥说过的话“仍然一成不变”。在香水河法人股拍卖事情上,刘永健为了捍卫某种对自己来说“一成不变”的东西,不惜和被委托方暗中联手串通,甚至以欺骗竞买人的方式将事情控制在可以操作的范围内。

出现这种情况的直接动因就是金钱利益的诱惑。当然,作为拍卖公司,它在经营活动中追求经济效益是自然的。但是作为社会公正裁判者的法官也参与到这场原本并不属于自己利益的追逐中来,就是不正常的了。在胜利大厦拍卖事情上,张仲平和侯昌平之间、徐艺和鲁冰之间都是有某些不为外人道的默契的。到香水河法人股时,刘永健更是想独自操作这件事,将拍卖委托函直接下给张仲平,并收取后者几百万元的行贿款。流金世界裙楼拍卖,因为法院被一诚拍卖公司攻关,在执行过程中一直考虑到一诚公司的利益,最后竟让国有资产管理方的代表伍扬将实物拍卖转换为债权拍卖,拍卖价格严重缩水,国有资产如愿被人预谋瓜分了。

《青瓷》主要讲述金钱对俗世人生的诱惑,人们对金钱的奔命,但刘永健的堕落已经触及到了权力对人生的侵蚀和渗透。到《红袖》,作家已经比较自觉地将人对权力的追求和对金钱的追拜并置起来看待。小说对李明启的正面描写直接反映了这一点。另外,对其它拥有或者接近权力中心的人物如何其乐、贺桐、曹洪波等的描写,也间接反映了这一点。何其乐并非不想帮邱雨辰的法律案子,而是怕自己搅进去出不来,自己的政治前途功尽弃。同样,他对待李明启的态度又是何其相似。曹洪波感激柳絮的地方,就是她“为人谨慎处事低调”使得他在一次大的考验时能够顺利

过关,保住了他现有的职务和地位。贺桐对柳絮的献身照纳不敏,而对她的红包却坚辞不受。他顾忌的还是自己的权势地位的重要性。

商人求财,官员弄权。钱权由此成为俗世人生矢志奋斗不移的目标。《青瓷》中的张仲平说:“每个人就想着挣钱捞钱,因为钱多钱少已经成了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他对权力的观念是这样的:“不做公务员还无所谓,既然做了,就要做好。什么叫做好?官升一级就叫做好”。在《红袖》中,作家认为“这差不多是一个有了财富便可以拥有一切的社会”。商人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赚钱,也只有一个原则,就是赢利,“什么是商人?就是凡事都可以商量的人,什么是生意人?就是遇到问题总能生出主意来的人。”

一千多年前,中国古代诗人感叹“商人重利轻别离”,指出了商人惟利是图的人格品质。其实,官员重权,也是间接地为了利。这样,官商之间就有了某种共同语言。中国有句古话,“千里做官,为了一张嘴。”利益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东西。何况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只要具备了权钱交易的可能性和机会,商人就会以钱买权,官员就会以权弄钱。官员一旦有了权,钱就不是问题。刘永健的胃口可谓大矣,另外一些比较稳重的如侯昌平、贺桐、曹洪波,也没有一个是吃素的人,省油的灯。而且,有这样一种文化的熏染,尽管他们暂时没有问题,但谁又能保证他们将来会怎样?因此,一旦在金钱与权力、鱼与熊掌两者不可得兼的情况下,他们就会做出意味深长的选择来,比如伍扬。

二

投身于金钱的怀抱,绞计于权位的得失,这些俗世本相,在作家看来,男人和女人虽各有其不同的表现,但却有相通的地方。

也许是作家有意安排,《青瓷》以男人为主人公,《红袖》以女人为主人公。“男人最关心的事有几件?无非两件。哪两件?一为谋财,一为猎色。说得好听点,一是事业,一是婚姻家庭。说得俗一点,是上面有得吃,下面有得做。”财富使得男人富有魅力,财富还使得男人更具有猎色的条件和能力,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这印证在张仲平身上,确实是太精当了。在商场上,张仲平春风得意,财运亨通,因此,他就特别具有女人缘。他第一次偶识江小璐,不到两个小时两人就上了床。他自认为重要的原因是,自己开着一辆崭新奥迪的成功人士形象使得江小璐根本就不想设防,甚至勾引他还来不及呢。张仲平和曾真的

故事虽然有些牵强,但一个美丽、单身、智慧的女子无缘无故地疯狂爱上一个有妇之夫的故事本身,不是这个男人魅力大,就是这个女人有些傻,但曾真显然不是后一种情况。她为他放弃工作,抛弃事业,为他流产、刮宫,维护他的家庭,爱惜他的荣誉,支持他的事业,对他简直无欲无求。如母亲般无私,有圣母似的大爱。这真是一个奇迹!张仲平还通过时不时地提一袋大钱回家,镇抚老婆,这样,家庭这一方也就相安无事了。于是,张仲平财色两得,如鱼得水。《红袖》中的肖耀祖,更是每天都浸泡在情色中的大佬。龚大鹏赢回了官司,马上有美女投怀送抱。

商人是这样,官员由于拥有权力,他们照样能够轻易获取金钱,收猎美色。刘永健是这样,林社长是这样,贺桐是这样,曹洪波是这样,伍扬还是这样。

男人以谋财猎色为人生追求,男人拥有财富也就坐拥了女人,这个世界被男人完全覆盖了。《青瓷》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情景。但同时它也说明了另一种辩证法,即男人也可能在失去财产的同时失去女人。这真是一个命运的轮回咒!《青瓷》结尾就是这样一种挽歌情调。刘永健出事了,张仲平为此损失了数百万现金,祸不单行的是,他的家外之家同时被唐雯侦破。财色尽失的同时,人生同样落魄。刘永健失官的同时,财产被查抄,生活作风问题败露。在《红袖》中,作家干脆让成为了光杆司令和穷光蛋的黄逸飞同时落得生不如死的悲惨结局。

男人有钱财才算成功男人,但成功的男人都追求声色。这样,男人和动物又有什么区别呢?反过来看,女人又怎样对待这样的男人呢?或者说,在她们眼里,男人又该是什么角色呢?《红袖》讲述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下的人生故事。

在柳絮看来,女人在这些方面一点也不逊于男人。男人以财猎色,女人则以色谋财。柳絮对贺桐、对曹洪波、对自己的副手杜俊都是无一例外地使用这种手段。女人犹如长在男人身上的一双短手,也像站在男人高挑肩膀之上的侏儒,凭借男人的手臂而伸得更长,凭男人的身体衬托自己的高大。年轻率性的柳茜,完全将男人为我所用,让男人成为自己提钱的银行和事业的跳板,在男人的头顶上伺机建立自己的财富王国。出场不多的小姑娘、小BB和安琪,她们游戏人生,玩弄男人于鼓掌之中的自如伎俩让男人的辛苦和自豪化为乌有。《红袖》结尾似乎是替女人的能力和智慧作结论的。三个女人“六目交织。几秒钟后,几乎同样的微笑,同时浮现在了邱雨辰和金顺喜的脸上……”当三个女人将男人控制的财产以智慧的方式窃取到自己手中的时候,她们是不是这个世界最后的赢家呢?

当男人自以为玩弄女人于鼓掌之中的时候,也许他们没有想到自己同时也会被女人玩弄。江小璐本来是应张仲平的指示去办理拍卖手续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江小璐却因为这次机遇转而站到了对手的立场上去,蜕变为自己的竞争者。《红袖》中的女人个个都是玩家,柳絮、柳茜、小姑娘、小BB,甚至邱雨辰,一个个男人在她们的运筹下、指挥中乖乖地行动,为她们服务。而在男人与女人的对玩中,最后狼狈退场的却是男人,比如黄逸飞和柳絮这一对,比如李明启和小姑娘两人,还有林社长和他的情妇,牌桌上小BB一个人赢得最多。在这一方面,《青瓷》和《红袖》显然差异很大。前者是男性视角,后者则是女性视角。在前者中男性是压倒性的力量,后者则是女性。在男人统治世界的时候,他依靠的是钱和权,男人是简单粗暴而愚昧的。而在女人控制世界的时候,她凭借智慧和魅力,女人更加会玩,玩得更加自在。

尽管有如此差异,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却都有着相通的人性特点,那就是对金钱的追逐,对权力的膜拜。女人追逐金钱是赤裸裸的,一点也不逊色男人。女人自己并不处于权力中心,但她知道怎么去利用它,怎么去驾驭它,这是女人对于权力的灵活性与现实姿态。

三

现代作家斥通俗文学为“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文学。这种曾经的罪状如今已经变成了通俗文学正面的赞誉和优点,即人们认为通俗文学的本色就在于其“娱乐性和趣味性”、“金钱主义”等^[2]。《青瓷》和《红袖》的成功都是比较典型的事实。

《青瓷》成功后,面对外人称自己为财经小说作家,浮石先生不是坚辞而是欣受。确实,小说销售本身就是一场商业成功。今天,尽管中国作家对文学还有因人而异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坚持,但在经济社会的观念里,恐怕不会有人会对畅销小说作者得到滚滚红利而产生恐慌和疑虑的。相反,渴望畅销,希冀赚钱已经成了作家们的集体无意识。因此,再不会有人贬斥所谓的金钱主义了。

通俗文学的意义就在于其真实,毛茸茸的真实。在通俗小说里,可以找到民间风情、闾巷习俗、社会原始生活画面的点点滴滴。题材也许写的是一群大众的生活事实,但假如他们的生活追求恰好迎合了大众的心理需要,小说自是能够赢得社会大众的亲睐和欢迎。《青瓷》也好,《红袖》也好,拍卖题材本身并没

有多少娱乐价值,也只是一群小众生活角逐的社会范围。但是,掀开拍卖公司赚钱发达的内幕,其令人咋舌的高额利润、一夜暴富的商业传奇、权力关系的社会运作、花天酒地的生活消费,对当下社会大众来说,无一不令人心向往之。因此,小说的娱乐性、趣味性和消费性就在于它编织着的这个神话恰好满足了当前经济社会里人们的普遍心理幻想,迎合了人们对金钱权力的追逐意识和梦想欲求。

娱乐、趣味和消费诚然不错,但是,阅读通俗小说,人总是有所遗憾。范伯群先生认为这是它的先天不足,“缺乏先锋性,基本上不存在超前意识,与‘俗众’具有‘同步性’”^[3]。这在《青瓷》和《红袖》中,表现得也比较明显。“生活是这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生活不是这样又能怎么样呢?关系对权力的操作,金钱对社会风气的腐蚀,权力对金钱的肆无忌惮的操控,在法律的边缘行走,甚至逆风而行,幻想用自己的聪明超越法律与道德的边界,缺乏道德的底线,躲避法律的惩罚,人对现实的毫无评判的顺从,这就是作家描写的现实和俗众人生。题材本身是客观的,这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作家取材的角度和人生态度。作家对形而下物质现实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完全认同态度,不能不令人担忧。特别是,通俗小说以其巨大的影响力博得读者的喜爱,但这种对社会病态现象的认同和影响的后果导致的社会价值取向却不能不让我们

焦虑。因其影响面广,影响力大,也就越具有力量和渗透性。在《青瓷》中,对社会批判最多的人居然是刘永健和丛林这般享受着社会权力最大化的人。在《红袖》中,李明启利用自己社会良知的角色做着腐蚀社会良知的勾当,居然还恬不知耻。柳絮认为丈夫黄逸飞的生活方式让她感到恶心,但是柳絮的生活方式和黄逸飞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前者以色谋财,后者以财猎色罢了。作家对张仲平的生活方式没有评判,甚至反思都没有,相反,还有刻意美化之嫌。作家宣扬金钱、美色、关系和权力,至于金钱获取背后的肮脏,美色导致的人性堕落,关系运用中的非法与掠夺,权力展开背后的丑恶等等,都一概被作为既定事实受到毫无原则的认可和拥戴。这样的笔法在其他通俗小说的描写中大量存在,有时还被作为看点和噱头得以强化。

参考文献:

- [1] 范伯群主编.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卷)[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0: 8.
- [2] 彭在钦. 世纪之交的当代通俗小说潮流与发展特征[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2005(3): 113-116
- [3] 范伯群主编.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卷)[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0: 23.

Secular • Man and Woman • Dream

LIU Zhiyu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2, China)

Abstract: The fictions, *Celadon* and *Red armbands*, have provoked a great response since their publication. As more successful popular fictions in the new century, they revealed inside story a shade corner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reproduced people's desire for power and money which drove desire to expand and fall of human nature. Fushi's fictions often narrative in the intricate relationships by exhibiting struggles between interests and power. From *Celadon* to *Red armbands*, and the writer's attitude and values also turn out to be a subtle shift and promotion.

Key Word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popular fiction; Fushi; *Celadon*; *Red armbands*

[编辑: 汪晓]